

審判民主：後解嚴台灣的 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

莊雅仲*

在國科會的專書寫作計畫補助下，終於得以完成 *Democracy on Trial: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的初稿。啓動我撰寫這本書稿的是 2006 年的紅潮運動，當時的學術界曾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評論整個事件。815 學者群認為阿扁政府帶給台灣民主與認同政治的是一個信任與道德的危機；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則在社論裡確認他們幾年前的警告，亦即解嚴後的新本土政權早已發展成不顧原則只知近利的沙文力量。這些不管帶點哀傷或嘲弄式的批評，都使我們無可避免得面對一個問題：到底過去 20 年的民主追求意義何在？剎那間，個人操守問題意外地將台灣民主置於天平上加以審判。

這是我這本書稿的題目由來。2000 年當陳水扁進入總統府時，他的新政府就被視為這個新興民主的試金石，因此扁政府的失敗，也逼使我們得重新檢視 20 年來的民主生活。當然民主作為一個名詞並非解嚴後才使用，漫長的戒嚴時期，當時的總統蔣介石都曾經發誓要追求民主，蔣經國也說他會堅守民主陣容。雖然戒嚴體制讓這樣的宣稱有點可笑，不過威權的國民黨統治的確也在台灣造就了一個有限度的選舉政治體系。

從兩蔣的民主陣容到後解嚴的民主化轉折過程，激起了我們想要理解當代發展的急迫心情，本書的書寫正是被這個無時無刻存在的張力驅動。民主化作為一個曲折的知性與情感的建構過程，測試著我們的認知極限：其中，轉化中的世界觀與感知結構持續改變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創造與活力也反過來形塑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

*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 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副教授

本書主要從社會運動團體與地方社群的角度發聲，見證那些在其間奮力工作的人如何回應與評價民主時代。在這些日常生活裡，民主被分析，被表達；民主生活因此是在持續轉變的價值與意義軸線裡，每個公民在此過程中自我探索、評價與實現。假如威權政治代表的是遺忘與欺騙，民主作為它的私生子（相對於法統）不只是有關記憶，這個記憶過程還必須全力抗拒再一次以簡單統一口徑的方式為之。

因此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說的第三波民主也許從來沒有走到鞏固或崩潰的十字路口，測試著這個民主社會是否有決心捍衛其核心價值。我們寧願將 20 世紀末的民主化視為某種發生在錯誤地方與錯誤時間的政治工程，尤其這個源自西方的概念及其許多基本價值已受到各方的攻擊與抗拒，甚至被認為已經過時。這些挑戰包括古典的社會主義或者較新穎的後馬克斯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後現代對福利國家的放棄，或者較晚近的全球主義對民族國家的無情攻擊。

換句話說，民主化並非一些抽象概念強加的過程，20 世紀末的民主化其實是一個跨域與時空交錯的思想流動及其效應的運作場域。本書將仔細把梳民主化作為一個長期的追求過程，以及在日常脈絡與組織過程中持續遭遇的滿足、斷裂與矛盾。

一、本書架構

本書探討後威權時代台灣的民主發展，提供從思考和實踐雙管齊下檢視台灣民主的機會。過去 20 年，民主實踐在台灣從來不是線性的進步主義，每一階段都無法避免矛盾的出現。相對於政治自由，大家感到經濟與社會自由的闕如；民主與現代化曾被視為一體，現在大家則嘗到放縱式自由經濟的苦果。

這些充斥於生活的猶豫與懷疑，使得我們注意到民主所帶來的一些基本概念及其效應。本書基本上檢視三類關鍵概念，分別是國家 / 市民社會、認同與地方性問題，也在本書中分成三個部分討論，很明顯地都聚焦在主體意識的議題上。具體而言，在台灣立場相左的許多人（統獨、左右）都一致同意，後解嚴的政治轉化基本上是一個國家重新打造的過程，這牽涉到「主權」概念。雖然民族主義研究者告訴我們主權在中文出現是相當晚近的事，但這個詞在許多有關台灣政治的場合卻相當敏感。古典的政治理論將主權定

義成以權威的方式代表某個政治社群作為的正當基礎，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則視這個權威行使至少在理論上屬於人民，因此革命性地創造一個人民意志的代表體系。在台灣戰後歷史上，這個超過一世紀以上的自由民主哲學影響，卻成為當政者不可承受的負擔。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必須一方面創造它仍擁有全中國主權的神話；另一方面，國民黨強調它屬於民主陣營的宣稱，則必須解釋它的權力如何來自人民授權，因此可以在台灣實施憲政民主。

這兩項任務其實都不單純，因此早在後現代學者開始挑戰主權的絕對性宣稱前，在持續的緊急狀態中，戰後台灣的主權基礎與有效性早就令人懷疑。1980年代開始的民主化只不過掀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因此民族、文化、國家這些概念全都成為攤在檯面上的問題，尤其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正遭遇內外的嚴重危機。另外有些學者認為，1990年代的國家打造不過是延遲的本土民族主義，試著趕上戰後新興國家獨立的浪潮。不過，時間的延遲卻也將這個民族主義政治帶入一個本土/民族/國家概念全都已經不一樣的巨變年代。

在上述的背景下，本書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使用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分析義大利復興 (Risorgimento) 時代的「被動革命」概念，來看待後解嚴的社會轉變，以瞭解不同的政治與社會力量如何爭奪領導權，卻無法完成全面性霸權的過程。「被動革命」概念點出一個特殊時空下各方力量競逐的(不)平衡作用，我認為對分析台灣的民主化有具體幫助。第一章分析的人民主權以及新憲政秩序的成形，在1990年代的台灣立刻遭遇挑戰。當中除了國家認同的持續爭議外，另外則來自新的社會力量的嗆聲。

第二章分析的是起自1980年代末期許多新成立的社會運動團體。在我進行田野的1990年代末期，這些團體及其網絡，已變成市民社會很重要的組織性力量。行動劇碼、組織策略、動員結構與政治操作都比先前預期的更加複雜、精緻，愈來愈多的人牽涉其中，運動也愈來愈整合。第二章因此分析這些社會力量如何成形、組織與整合。於此，我分析了抗議現場、組織瑣事以及願景想像等等，深入探究這個社會運動的世界。

第三章則探討通常被我稱為「大聲公眾」的形成史，構成國家/市民社會單元下的第三個主題。民主為公民權與社會生活注入新元素，這些新元素也將民主轉變為一個無法抗拒而引人入勝的生活方式，甚至這個吸引力常常造成極端的情感爆發。一時間，公共議題似乎變成要拼輸贏的事情。所以我在這一章檢視這個政治表達與溝通的新現象如何重新定義公民社會，而且這

個政治熱情所形成的新場域—不管是在電視螢幕、客廳或咖啡廳空間裡—也成為社會與政治、地方與全球交會的界線地帶。

本書第二部分檢視台灣的認同政治，認同問題在台灣可說具有其爆炸性。書中第四章於是分析「本土」概念所帶來的認同政治發展。雖然很多批評者視「本土」政治已成為過去 20 年一個新國家意識型態的根基，因此被剝奪了許多原有的批判與實驗內涵。但是，我仍然認為這個本土認同基本上是將個人和文化重新連結的過程，過程中無法避免得面對階級、環境、性別等等分別帶來的隔離問題。因而本土認同政治讓我們得以從自我認知裡來轉化這個差異政治，並產生行動的動力。據此，本章追溯本土概念的系譜，並檢視本土概念在社會運動動員與福利國家政治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地，本土政治迫使個人追問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到底要變成什麼樣的狀態。尤其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無情年代裡，這些追問是一門道德的政治和經濟學。

第五章則探究認同政治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一個新的少數政治，其間族群被理解成多元文化表現的根源，而民主提供了這些具有創造性與另類想像的文化表現的舞台。這個把族群視為想像異質性的創造過程看法，將民主推展至 Charles Taylor 所說的「承認政治」的階段。因此本章探討了台灣社會裡兩個有關族群承認政治的案例：其中之一是有關邦再人的部落主義實踐，重新挖掘了令人震驚的一段被湮滅的過去；另外則是常被我稱為客家基進主義的文化復振，顯現台灣漢族認同的異質性。在這兩個案例裡，我都發現某種形式的族群之夢：在這些夢裡，長期遺失的文化價值從過去陰影中重新激盪出來；在這些激盪裡，承認政治是日常意義的再造過程，其中總有很多具爆發性的文化遭遇。

接下來的第三部分以三章的篇幅探討民主的地方性問題，包括社區想像、性別動員與地方政治，並以台北市一個地方鄰里研究為例。其中，第六章檢視近 10 多年台灣的地方動員，探討「社區」這個概念，及其對民主深化的影響。社區運動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受到各界重視，行政院文建會指導下的社區營造於是成為醒目的公眾議題。雖然當今愈來愈多人相信地方的特殊性早已在現代化及全球化浪潮中消失殆盡，這個轉變中的動員模式其實和在地日常世界的複雜性直接相關。所以，我追溯了「社區」概念在臺灣戰後發展過程中的意義轉折。這個轉折指出，對於戰後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工業化過程及其都市影響，社區意義的轉變某種程度上代表一種回應—回應這

個工業化過程下的都市變遷，尤其是都市居民的認同變化與地方意識的形成。

第七章檢視台北市鄰里裡的媽媽網絡。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社區媽媽」成爲都市社區動員的主要行動者之一。本章探討這個新的女性組成，以及因此形成的「集體母性」問題。以台灣地方發展的脈絡而言，社區媽媽代表新近興起的一群都市女性，兒女大多已升中學，剛剛卸下密集的養兒育女責任，因此有較多的時間參與社區事務。本章的論點是，這批都市生力軍必須從一個新的「地方照顧」方法來加以理解。這個新方法和地方事務的「性別化」有關，因此激起了許多不同的社區想像，而這些想像及其實際效果引領都市社區進入一個特殊階段，其中必須面對舊的地方網絡以及新的地方商業發展論述。

第八章則探討都市鄰里地方政治，以及地方權力操作與競爭如何影響社區發展。本章從個人選擇、組織轉化與非正式的人際網絡，探討地方性的爭議，著重在瞭解爭議過程中的個人決策與社區想像，並強調，爭議雖然常引來厭惡與隱諱，卻必須放在一個追尋社區意義的脈絡來看。另外，爭議和都市社區的政治經濟情況相關，牽涉到個人與集體性的情境感受。

在結論中，本書特別思索台灣民主的未來。民主如果也有生命週期的話，這半年來台灣政治正式進入了憂鬱期：過去成爲現狀的逃避空間，而現在則是某個光榮過去的不幸後果。過去讓人緬懷，而現在則令人憂鬱。這個憂鬱政治起因於國內兩大政治勢力都不願正視現實（就算看到，也只會兩手一攤），而無法具體持平的看待從經濟到社會福利、從兩岸交流到國家認同等問題。

這個現實牽涉的是：台灣從解嚴到現在的 20 幾年間，到底在政治、文化與社會的不同領域裡起了什麼樣的變化？我們的政黨組織與公民團體在新的政治文化下如何轉型與調適？弱勢文化的現身與發聲如何告訴我們民主生活的有力與有限？經濟、福利與環保又在什麼樣的社會願景下被調節？在地怎麼認識自己，跨國又如何連結他方，以對抗全球化的同質力量？大家也許都承認，過去 20 年台灣在這些方面都交出不錯的成績單，至少各領域中都有人在努力。可惜的是，我們的兩大政黨，以及因之而起的選舉動員論述裡，卻鮮少開誠佈公地看待這些向上轉變所帶來的新政治歷程。

本書見證了這 20 年社會生活的轉化，希望已對上述的現實問題加以說明、釐清。在民主憂鬱的困境裡，過往的意象被帶回，意欲成爲目前的真

實。但是，欲成功突破自我，在於不要被許多過往的成見左右。過去不是牢籠，反而應當是使我們得以掌握並突破現狀的上升助力。只有如此，民主的未來才會是人人可享有一片天地的樂土。

二、人類學的任務

1998 年的春節假期，我在台大附近的爵士樂酒吧和當時的勞工陣線總幹事郭國文進行訪談。郭國文談到希望能將他參與社運的經驗寫作出書，問我是否可以幫忙。我很樂易地接受，並透過幾次的深度訪談幫忙整理他的記憶與思緒。這些訪談不只勾起了他的回憶，也使我陷入何謂人類學任務的長考。作為研究台灣社會的人類學工作者，傳統民族誌研究裡到達與離開的尋常戲碼並不適合我的狀況，田野絕非等待填充的空白紙頁。做為台灣人和行動研究者，我一方面有在家的熟悉感，一方面卻也時時感到因迷惘帶來的焦躁。

和郭國文的訪談已是 10 年前的事了，當時的思索卻一直讓我不敢忘記做為人類學家的角色與責任問題。我記得為什麼我要從機械系的大學畢業生，轉換軌道選擇人類學作為志業。人類學作為社會分析的有力工具，對當時自許為社會改革學生的我，具有無比的吸引力。本書以英文寫出 20 多年來以行動見證的歷史，也寫出許多人的關懷、激動與挫折，過程中無時不在提醒我，不要忘記人類學和本書主題—社會運動—間無法切割的關係。

本書嘗試解決書寫台灣民主和社會運動時常遇到的問題，希望這些理論思索可以幫助瞭解台灣社會—對我來說，既是家也是田野，而研究成果也能成為進一步投入的憑藉。